

本土关怀系列 2

馬華文學

內在中國·語言

與文字

黃錦樹著

本书是作者多年
集。全书环绕着三个主题展开：内在中国（中国意识）、文学语言、马华文学史，藉以思索辩证马华文学的本质、范围及限制。内容分三部分：通论、专论及附录。专论部份包括对神州诗社、潘雨桐、李永平、王润华等曾留学台湾的作家的讨论。本书特殊之处在于正视“台湾经验”对于马华文学的积极作用，并藉以勾勒马华文学未来的可能走向。



华社
资料
研究
中心
出版

ISBN 983-9673-34-3



9 789839 673340

本土关怀系列 2

馬華文學

內在中國·語言

與文字



黃錦樹著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

作者：黄锦树

出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Huazi Resource & Research Centre Bhd.

No. 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03 - 2734035 Fax: 03 - 2734037

编辑：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出版部

封面设计：林碧凤

打字排版：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出版部

承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Percetakan Advanco Sdn. Bhd.

23, Jalan Segambut Selatan

512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发行：华资企业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1996年2月1日第一版

印刷量：0-1,000

定价：RM18.00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 - in - Publication Data
Huang, Jinshu, 1967 -

[Mahua wenxue: nei zai Zhongguo, yuyan yu wenxueshi]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 / 黄锦树著

(本土关怀系列；2)

ISBN 983 - 9673 - 34 - 3

1. Chinese literature - Malaysia I. Title. II. Series: Bentu guanhuai
xilie; 2

895.1

目 录

1 ■绪论：在马华文学的边界

■卷 I

- 13 ●“马华文学”全称：初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学”与“华文文学”
- 27 ●马华文学的酝酿期
——从经典形成、言/文分离的角度重探马华文学史的形成
- 55 ●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

■卷 II

- 81 ●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
- 135 ●新/后移民：漂泊经验、族群关系与闺阁美感
——论潘雨桐的小说
- 162 ●在遗忘的国度
——读李永平《海东青》（上卷）
- 187 ●内/外：错位的归返者王润华和他的（乡土）山水

■附录：

- 219 ●选集、全集，大系及其他
- 224 ●在“世界”之内的华文与“世界”之外的华人
- 228 ●记忆之中的遗忘
——谈杨升桥先生的文学评论

绪论：在马华文学的边界

一、

60年代后期，在美援和戒严体制之下蕴酿着经济奇迹的台湾，因着美国政经势力的直接干预而催生了第二度的现代化（相对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近代化”），相应的美国殖民文化也在体制（譬如学院）内外漫延繁殖，为那个时代的新人类塑造新的价值信仰与世界观。然而那也是大中国符码泛滥的时代，偏安的长期创伤并发为妄想症，白色恐怖在无声中化为日常。小镇成长为都市，都市在来不及准备之下蓦然膨胀为都会。台北，就是那样一个错乱的城市：错乱的建筑、错乱的文化、错乱的时间。

日本统治下逐渐近代化的台湾在历经国民政府的重新“洗牌”之后，原有的秩序荡然无存，近代化的时钟也被往回拨，这回是在帝国以保护而非殖民的名义下“现代化”，却也迎来了第二度的现代主义（相对于日据时期，30年代的现代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时空，顺着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一批又一批带着唐人血统的华裔子弟被偏安政府迎以“祖国”之名，他们便是所谓的

“侨生”。许多人都赶上了现代主义（及其他后续的思潮）的列车，在这里业经多年刻苦经营以谋求学者 / 作家的（文化）身份证^①。

很少人会去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事，不论是大汉沙文主义的巨大(grand) 视域或本岛主义的短浅目光，都鲜少留意这些夜郎国的访客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赋予了这新兴都会怎么样的意义。确实，对于李永平、王润华、李苍（李有成）、陈慧桦、纪晓如（张贵兴）、商晚筠（黄绿绿）、潘雨桐（潘贵昌）、温瑞安、张瑞星（张锦忠）等人而言，台北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下的都市及文化空间，犹如 30 年代的东京之于日据下受日本教育长大的台湾青年——以日语写作的那些人，作品亟求在日本文坛获得认可，以期鱼跃龙门，荣归故里^②。亦如 20 世纪初期以来的巴黎之于拉丁美洲的文学青年^③。台北占了这样的便宜源于历史的偶然，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的大马政府切断了大马华人留学中国之路，兼之文化大革命及伴随的无穷天灾人祸，否则那样的一个孵育之地应该是上海或北京。

注^①：指它的专业性受体制或知识社群认可。文学奖（如两大报文学奖）、选集（如《年度诗选》）及被讨论等等都是被认可的形式。

注^②：重要的例子如张文环、杨逵、吕赫若等等，被日本文坛肯定（作品获奖或被评论家称赞）对他们而言犹如获颁“作家”身份证。

注^③：现代主义的兴起和现代意义上的都市（以机械文明为主体）的形成有着必然的关系，在精神上甚至可以说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相当激进的反省。因而随着不同地域的现代化，也会有不同型态的现代主义文学，只是在美学机制上有其共同性。详参马布雷德伯里等编，胡家峦等译，《现代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这些来自马来西亚的异乡人大都身负种族政治下的文化 / 政治创伤，对于政治非常敏感却又冷感，反映了大马华人谨慎机敏的生存哲学。许多写作者来台之后逐渐搁置了创作之笔，在学院里栖身。而那些持续创作的，无可避色的都必须重新面对他们选择的那一套表意系统——汉族的语言文字。在这群人中，不同的写作者有不同的代表性，各以文字为一己的存在情境添注做传，也都一无例外的埋头致力于淬炼他们的书写语言，而经历了一个“从华文到中文”的辩证扬弃。李永平以他对汉字的偏执狂恋而成为异数中的异数，已跨越单纯的透过中文书写而获得文化身份，而更进一步的，企图重新创造大汉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种族、神话起源的史诗：《创世纪》^④。纯粹就野心而言，他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异乡人，甚至也超越了两岸所有重要的中文作家；而且也把他《吉隆春秋》（1986）时代的读者远远的抛开，以艰涩厚重的《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联合文学，1992）违反了当代台湾读者的阅读期待，似乎也把自己逼上了绝对孤独的纯粹艺术之路，为未来，或后世，而非为当代“人”而写。时移事往，沧海桑田，留下的也无非是文化的遗骸与残碑，李永平仿佛便是那么样的一个不无“恋物”之嫌的

注④：李永平：“希望我能在五十岁以前到大陆，在陕西附近找个定点，然后在黄河流域流浪个十年，亲眼看，亲耳听，把中国丰富语言吸收个够，然后写一本《创世纪》就是中国的创、世、纪三个字。”（〈李永平：我得把自己五花大绑之后才来写政治〉，邱妙津纪录，《新新闻》，1992，4月12-18日）。他又补充说：“写‘海东青’是在找中国，可是我真正要写的是‘创世纪’，那就是要找根了，找中国人的根。”（页66）

铸碑者，文字对他而言具有本质的意义：那里头窝藏着 he 寻求的“道”（logos），需要的劳作相对而记不止是经由书写（writing），而是铭刻（script）。——让汉字字形的物质性浮露。另外，李永平以东马为背景的少作《婆罗洲之子》（中篇，婆罗洲文化局，1968）及在台北出版的第一本短篇集子《拉子妇》（华新，1976）不论是文字、技巧、题材的掌握，都已具有相当的专业程度，可以目为是东马华文文学的先驱；同样来自砂劳越的张贵兴也以新著《赛莲之歌》（远流，1992）精致的艺术语言给予读者一幅全新的，与东马有关的艺术视景。他们的实践，也已非吴岸所强调的“社会性”、“独特性”^⑤之类的陈旧观念所能局限的。相对于东西马“现实主义”代言人一再叨念的“社会性”，这一群旅台的写作者追寻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建立在文化性之上的，“书写的可能性”。也因为这样，他们无可选择的位处于马华文学的边界上。

二、

我对马华文学的思考和反省始于1989年在台大中文系刊《新潮》（48期）发表的〈马华文学的困境〉，“困境”和“独特性”是马华现实主义者最爱复述的两个话题。我把困境分为内在

注⑤：详吴岸，〈谈砂华文学的独特性〉及〈砂华文学的独特性〉（收于氏著，《马华文学的再出发》（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藉吴岸的操作也可以反駁黎声那种企图把“马华文艺独特性”还原为单纯的历史口号的作法（〈关于文艺口号〉，《星洲日报·龙门阵》，4/7/1992），在吴岸的“示范”中，它确是具有强烈规范意义的。

困境与外在困境两种，后者指大环境，包括政治、教育、发表、出版等等；前者指的是写作本身的问题，这是写作者本身必须克服的问题。在后来的讨论中，几乎完全偏重这一问题。而那篇文章，也因为写得太简单，所以没收进集子。1990年在《新潮》(49期)发表了〈“马华文学”全称之商榷——初论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与华人文学〉，援用陈志明先生的人类学研究，企图质疑国家文学与以华文文学为主体的“马华文学”概念。对我而言，最大的收获是因而结交了一位可以论学的好友——林建国；他读了比我还兴奋，以清大文学所两年的训练为基础，他读出了当时我并无法完全理解的掌握的意义，而后发展为一篇他自己的重要论文：〈为什么马华文学？〉(《中外文学》21卷10期，1993)，企图为新时代的马华文学研究奠立理论基础。收在本集子中的〈“马华文学”全称〉基本上没做什么更动(除了题目删去了两个字)，聊做纪念而已。

同年于《大马青年》8刊出另一篇习作〈“旅台文学特区”之意义探究〉，开始注意台湾经验对于某些马华作家的决定性影响，也打算以自己落脚的地方做一点持续性的研究。这篇文章的论点过于简略，是以不录。然而既然以旅台为关注点，尔后我费了许多气力收集资料，以神州诗社为对象，写了〈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经过和林建国的多次往返讨论，修改后和他的〈为什么马华文学？〉一道于1991年9月在淡江大学中研所主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宣读。那年我刚考上淡江大学中文所硕士班。“神州”初稿部份内容次年发表在《大马青年》9；后来经过一次比较大的修改，刊登于《中外文学》，但那已是1993年暑假的事了。

这样的自我训练令我学到很多东西，深深察觉中文系的训练根本上是不够用的。而台大中文系集体的知识偏执，根本就不鼓

励学生去留意当代的问题，更别说是作为边缘之边缘的马华文学了。“神州”是一个隐喻，然而，它不只是一个隐喻，它也象征了一种文化疾病；大本营不在别处，正是在中文系。处理“神州”，也等于是反省自己的问题。中文系自然是无可救药的，被国民党政权绝对合理化的大中国主义；而身在“海外”的我们，在种族政治长期的阴影里，经受民间汉民族优越感的濡染，加上华文教育赋予的象征意义，十之八九大概也都曾经大中国，忧伤的哀怜着龙族的流离。多愁、善感、滥情，轻易的就造就了一个感时忧国、行吟于想像的五月之汨罗江畔的小诗人。而这，似乎也是许多旅台作家共同的过去。换言之，透过“神州”，我仿佛掌握到一些基本的东西。对作家而言，还有什么比语言文字更为基本呢？

1992年发表的〈马华文学的酝酿期？〉企图从文学语言创造的角度质疑现有马华文学史分期及写作的合理性，也批评了单纯从史料、政治变迁来界定马华文学史，对于马华作家不顾文学本体仓猝“自我经典化”也深不以为然。同年，也因为针对褫素莱〈开庭审讯〉（1/5/1992，《星洲日报·星云版》）回应了一篇〈马华文学“经典缺席”〉（28/5/1992，《星洲日报·星云版》）而招来夏梅（陈雪风先生）理路错乱的〈褫素莱·黄锦树和马华文学〉（15/5/1992，《南洋商报·南洋文艺》），文中一再强调马华文学“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强调“拓荒”；殊不知文学并不能仅仅只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已，它必须具有更为“本质”的成份，那才是更为重要的议题。11/8/1992我回应了一篇〈对文学的外行与对历史的无知？——就“马华文学”答夏梅〉（《星洲日报·星云版》）；夏梅在16/9/1992又写了篇题目很吓人的〈批驳黄锦树的谬论〉（《南洋商报·南洋文

艺》），除了让我领教了马华文坛长期以来积累的论辩习气^⑥，也比较能理解为什么文坛上有那么多混战式的笔战。我们根本找不到共通的语言及对话的空间，我也实在懒得再“回应”了。鸡同鸭讲，徒然辞费^⑦。退一步想，我的急切却也造成某种程度的专断，对许多被“流弹”伤及的人也并不公平。人寿有限，与其浪费时间去争辩，不如多花点精神去写作，所有的争论也无非是对理想作品的呼唤。这些产生于论辩中的文字也一概不收，因为基本论点都已呈现在〈马华文学的酝酿期？〉及今年补写的〈华文/中文：“失语的南方”与语言再造〉。后文企图从一个更广大的视域来看待我们的语言困境。这些年来持续阅读台湾、大陆及大马的华文文学作品，感触很多，大陆小说家占尽了一切便宜（丰富的人文资源、人才辈出、发表园地众多、国家体制的保护、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环境如此不利，保护主义无济于事，借用他人的资源及不断的反思求进方是上策。

卷一中的三篇文章都涉及马华文学史的重新审视，而且特别从文学语言的构成的角度，企图重新画出马华文学史的视域，也借着一些个案，翼图凸显文学语言的形成对于特定文学传统的重要性。语言的困境是文化困境的表征，贫乏的语言反映了文化上的贫血。对于文学语言的强调无非是希望马华文学能在它们的基

注^⑥：这种习气大概袭自鲁迅。马华杂文写作者学到的只是鲁迅的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与专断，殊不知如果去掉鲁迅那过人的才情、学养、洞察力及知识份子的勇气，剩下的也只不过是位酸腐的绍兴师爷而已。

注⑦：人与人沟通委实不易，况且涉及意气。

本单位上得到改良或更新，旅台作家的尝试只是众多可能途径之一种，在理论上应具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十分希望见到后起的作家们能继续开发下去。

文学史不应该是墓志的编录，许多现象需要我们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去重新解释，许多「事实」也需要我们从素材中重构出来。此外，不论是重构或解释，都应该具有它们基本的实践功能：鉴往以知来。文学史中存在着的“问号”不仅仅是：过去发生了甚么事？为何发生？如何发生？更该包含着：它的意义何在（对于大马华人及华人文化）？它对当代的文学创作有何启发？理解历史也正是为了理解当下的处境。希望将来仍能本着这样的立场，继续做一些零星的探索。

三、

卷一中另外三篇文字，分别论及潘雨桐、李永平及王润华。三个作家都出生、成长于大马，如今都在不同的国度发展。各有各的代表性，也各有其象征性。他们的共同点（如“神州诗社”同仁）是曾经旅台，成名于台湾。可以讨论的例子当然不止他们，这里只是尝试做一点选择性的取样，着眼于他们的书写实践中呈现出的议题特性。

三个个案中，李永平决心做中国人，潘雨桐回乡，王润华“错位归返”于新加坡；他们都深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对于文学的美学要求相当高，在大马之外的华文文坛也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从意识型态批评的角度，三者却都各自呈显出或异或同的议题性：首先是中国映象的问题（李永平、神州及潘雨桐小说

中的美学陷溺），其次是再现（representation）的问题（王润华的“南洋”、潘雨桐笔下的华人与原住民）……。对我而言，这一系列也还只是刚开始而已，考虑延伸至诸如张贵兴、温任平、梁放、小黑、“感时忧国诗”（傅承得、小曼等），或者上推至战前的铁抗。不论是针对怎样的议题来谈，仍然要呼吁评论者们不要再那么道德伦理挂帅，把作家当作家，把作品写好是作家的首要社会责任，也是鉴定作家之前的首要判准。

马华文学的精采之处或许并不在于它的本土性，而在于差异文化与个别经验交揉出的多重性（犹如马英文学）。在我的同时代人中，也越来越多这种处于大马边际上的华文写作者，希望将来有机会可以讨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中国留学之路通畅，很可能会激发另一种新面貌的马华文学。在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论是科技、医药、文化、艺术，都不得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取法外国。留学生的宿命也许就在于他们必须做先锋。

〈附录〉三篇小文章，〈记忆之中的遗忘〉批评的对象是杨升桥先生的“文学评论”。有那么一两年，杨先生的评论文章充斥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个中的论点，援用的概念在在都十分可疑。文章寄去《星洲日报》后，积厌了许久。有一回访王祖安，他把稿子交还我，却已是打好字的二校稿。祖安面告，他曾把我的稿子寄给杨升桥，杨说不打算回应，却似乎颇受刺激。此后也很少见到他的文章发表在大马华文报章上了。这篇文章因为遭遇特殊，所以我也把它收进集子，聊做初次发表罢。

〈选集、全集、大系及其他〉是呼应陈应德先生对于续编《大系》的呼吁，顺便也涉及一些马华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世界”之内的华文与“世界”之外的华人〉企图挑战的是

以中华民国（台湾）为当然中心的“世界华文文学”概念^⑧。

四、

集子中大部份篇章都写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其中论王润华和潘雨桐二文的初稿还是施淑教授“文学社会学”课上的期末报告。感谢她经常给予鼓励及提供文章修改的意见。也感谢林建国先生；在如此寂寞的志业里，可以往返论学，周济资源者，一人而已。

大部份的篇章都谈不上有什么定论，只是提出一些讨论的参考点。就我个人而言，写这些文章每每苦于理论资源不足，而眼高手低，难以尽兴。处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殊国方语，犹恐岐路亡羊。常常写到能力的局限处，只怕犹不免处处犯错；每一个时代都该有几块垫脚石，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感谢陈亚才先生及华资幕后的工作伙伴们。每一本书的出版都要耗费许多社会成本，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又，书中所论作家、议题，虽然对马华文学现实主义者而言大体属于“非主流”

注^⑧：“世界华文文学体系”的构想表面上为所有的地域华文文学都保留了位子，颇可以满足各地域华文作家的心理需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中国、台湾两地之外，其他的地区只不过是陪衬而已。在美国的许多华文作家，在文学属性上仍属于台湾或中国；香港被纳进中国（或中华民国，因它的殖民地命运即将结束），如此，所谓的“大同”也只不过是改头换面的主流一流流说，在这样的“体系”中，马华文学”是衬托繁花的其中一片“绿叶”而已。

⑨我还是决定把这本书题献给包括我父母亲戚友朋在内的大马华人。

农历年前夕
1995年1月25日

注⑨：1991年在淡江举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当我和林建国宣读完论文后，陈应德先生曾坦率的发言，指出我们论列的作家对马华文坛而言“根本不是主流”。这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而当我听到自己被旅台的学弟妹列入“本土派”时，不免错愕。我们这种人，还是被归为“其他”的好。

